

国际减贫合作中的贫困类型识别^{*}

——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徐秀丽 赵捷 孙进

【内容摘要】 识别“一带一路”国家的贫困类型，推动精准减贫合作，是中国减贫经验有效分享的重点和难点。借助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有利于推动国际减贫合作。研究发现，在贫困程度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贫困状况呈现较大差异，高贫困度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中等贫困度国家较为均衡地分布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而少数低贫困度国家则分布在欧亚地区。在贫困的成因方面，高贫困度国家的贫困往往是人力资本缺乏、社会治理不足、资源制约、联通落后和金融发展滞后等多种因素复合、叠加导致的后果，而中等和低贫困度国家也往往受到以上单一或双重因素的影响，导致国家陷入贫困。对贫困类型的识别有利于在国际减贫合作中的区域国别瞄准、方式选择和多主体参与等方面为国家提供政策参考，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全球贫困治理 贫困类型 国际发展合作

【作者简介】 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193）；赵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193）；孙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193）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4)04-0057-22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40400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21&ZD18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国和中亚农业合作的方式路径和策略”（71961147001）的阶段性成果。

在“一带一路”减贫合作中,识别合作国家的贫困类型是推动需求对接、精准治理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①在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教育减贫、科技减贫、减贫示范援助更是被纳入了务实合作项目清单。消除贫困已进入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之中,成为惠民生最直接的体现。^②但“一带一路”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极大,贫困表现各有不同。如何对其贫困程度和特征进行分类,并开展比较研究,以细化减贫合作方略,加强对“一带一路”贫困治理的落地政策设计,破解国际减贫合作中的区域瞄准、方式选择和多主体参与等方面难题,仍然是一个关键性议题。

当前学界关于“一带一路”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在研究对象上,既有研究聚焦某一国家或区域,关注减贫合作的路径与成效,如中缅减贫合作、中非减贫合作等,^③但对“一带一路”国家整体的贫困特征的总结仍有待深入。其次,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们关注到了“一带一路”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不平等状况等方面的特征,^④但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特征的分类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最后,在方法适用性方面,国际上既有的多维贫困指数,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多维贫困指数,其研究范围以全球层面为主,在“一带一路”区域减贫合作的适用性仍有待观察。总的来看,立足“一带一路”整体视角的贫困研究,在识别方法和类型分析上仍有待深入,基于类型分析提出相应的贫困治理政策更是贫困研究亟待深入和拓展的新维度。

① 习近平:《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中国政府网,2021年4月20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20/content_5600778.htm。

② 万喆:《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全球减贫:内在联系与有效路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期,第107—111页。

③ 李涛:《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视域下的中缅减贫合作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09—120页;安春英:《全球贫困治理中的非洲减贫国际合作》,《当代世界》2019年第10期,第23—28页。

④ 吴振磊、康颜钰、王泽润:《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减贫的启示》,《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3期,第107—116页。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贫困识别方案的可操作性分析原则,引入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人力、社会、自然、物质、金融五个要素,尝试构建了涵盖人力资本、社会治理、资源禀赋、物质联通、金融资本五个维度的“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以目前可获得数据的69个参与共建的国家为评估对象,分析“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为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国家贫困治理提供分国施策、分类施策的参考。

一、“一带一路”国家贫困识别的既有机制与方法

当前,关于“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特征的分析,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全球视野下的贫困研究。此类研究以世界银行、UNDP等国际组织为代表,世界银行运用国际贫困线评估全球贫困程度,UNDP运用多维贫困指标(MPI)跟踪个人基本能力,2022年MPI报告中涉及7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些研究关注到了贫困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但缺乏对“一带一路”国家集群性的系统研究。第二类研究聚焦“一带一路”的单一国家或地区。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缅甸、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此外,对东盟、非洲和中东欧等地区也有较多关注。但此类研究仍缺乏针对“一带一路”国家贫困问题的系统探讨。第三类研究是将“一带一路”作为整体。此类研究近年来有所增加,如张晓颖等分析了六大经济走廊相关国家的贫困程度,指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①总体而言,既有的对“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特征的研究,为后续分析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工具,但从整体上梳理“一带一路”国家的贫困类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的贫困程度和贫困特征做进一步分析,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国际减贫治理方案的研究仍较为有限。

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对“一带一路”国家某一领域的发展水平进行测

^① 张晓颖、王小林、陈爱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4期,第33-45页。

度并分类的研究相对丰富，这类研究主要围绕“五通”、绿色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发展、综合发展水平等主题展开分析与讨论。例如，翟崑和王丽娜从旅游活动、科教领域交流、民间往来3个维度测算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民心相通水平，将东盟10国分为“顺畅型”“良好型”“潜力型”和“薄弱型”。^①除了单独对民心相通水平测度以外，区浩驰等从经济机会、社会福祉、环境质量、气候行动四个维度，将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的112个国家按可持续发展水平划分为四类。^②当前对“一带一路”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研究相对较少，胡必亮和张坤领从经济、治理、资源、环境、社会、市场、产业、规模八个维度，对148个共建国家的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从动态变化、区域分布方面讨论了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特征。^③上述文献为“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的识别提供了实证研究参考。

此外，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国内外研究形成了“成因分类说”和“程度分类说”等主要学术观点。成因类型主要以致贫因素为标准进行划分。例如，吴国宝将贫困类型划分为资源制约型贫困（资金、土地等方面的缺乏）和能力约束型贫困（体力、智力、技能等方面的缺乏），^④李小云等从农户脆弱性的分析视角，提出了人力资产缺乏型、自然资产缺乏型、金融资产缺乏型、社会资产缺乏型、多种资产缺乏型五类贫困类型。^⑤在程度分类方面，李实和约翰·奈特（John Knight）基于贫困的持续时间，将中国城镇的贫困划分为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三种类型。^⑥彼得斯（David J. Peters）根据1980—2000年美国的贫困率，将3万多个次要民事区（Minor Civil

① 翟崑、王丽娜：《“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现状实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51—62页；刘卫东等：《“一带一路”建设第三方评估报告2013—2018》，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页。

② 区浩驰、郭凯迪、王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及中国合作建议》，《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年第6期，第175—184页。

③ 胡必亮、张坤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测算与评估》，《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3期，第91—106页。

④ 吴国宝：《对中国扶贫战略的简评》，《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8期，第26—30页。

⑤ 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4期，第32—39页。

⑥ 李实、约翰·奈特：《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第47—58页。

Divisions) 划分为高度贫困、正进入高度贫困、下降的高度贫困三类。^① 在贫困类型识别的具体操作层面, 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等学者强调从能力的相对剥削视角来理解贫困, 由此学术界对贫困的识别开始从单维的收入角度转向多维的福利角度。^② 例如, 瓦格尔 (Udaya Wagle) 从经济福祉、能力和社会包容性三个维度, 设置了人均收入、营养状况、受教育机会、户主职业等 15 个指标研究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贫困情况。^③

在既有“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特征研究的基础上, 围绕减贫合作的路径, 既有文献主要从机制模式分析、减贫效应验证、中国减贫经验适用性等主题展开。^④ 但总的来看, 关于“一带一路”减贫合作的研究还存在三重困境。首先, 在地理空间瞄准方面, 现有研究强调以“一带一路”沿线六大经济走廊不同的贫困特征为基础, 寻找减贫合作的重点靶向区域, 但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已涉及全球范围内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的国家, 传统聚焦“廊带”的局部瞄准机制可能需要调整。其次, 在合作方式的选择方面, 既有研究指出, 通过贸易、投资、技术推广和投融资等方式为“一带一路”贫困治理提供助力, 也证实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给合作国家带来显著减贫成效。^⑤ 双多边合作机制体系也为共建国家间政策、规则和标准的协调对接和信息的交流共享提供了平台。^⑥ 但在操作层面仍需建立特定的区域国别减贫合作系统, 从而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减贫合作抓手。最后, 在

① David J. Peters, “Typology of American Poverty,”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 1, 2009, pp. 19-39.

② 王小林、冯贺霞: 《2020 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 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 《中国农村经济》2020 年第 3 期, 第 2—21 页。

③ Udaya Wagl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with Economic Well-being, Capabi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A Case from Kathmandu, Nepal,”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6, No. 3, 2005, pp. 301-328.

④ 参见郑雪平: 《“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驱动合作国家减贫研究》, 《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 第 50—61 页; 吴振磊、康颜钰、王泽润: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减贫的启示》, 《学习与探索》2022 年第 3 期, 第 107—116 页; Xie Niyun, Chen Aili, Wang Xiaolin, and Zhang Xiaoying, “Does the BRI Contribute to Poverty Reduc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 DID-Based Empirical Tes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Vol. 10, Article No. 872, 2023.

⑤ 毕朝辉、于津平、史亚茹: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3 年第 5 期, 第 69—83 页。

⑥ 李远、图古勒: 《“一带一路”规则“软联通”的推进和优化路径》, 《国际展望》2023 年第 5 期, 第 21—35 页。

主体参与方面，既有研究指出要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官方和民间的关系，但当前“一带一路”民生项目以政府为主导，对于企业、民间组织、智库等主体应该如何参与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仍不够清晰。本文试图突破上述研究局限，通过贫困程度和贫困成因的分类研究，解析“一带一路”国别视角下的贫困表现，从而为国际减贫合作提供参考。

基于此，本文引入国际贫困测度常用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尝试从贫困类型识别方面丰富“一带一路”贫困治理研究，探索构建“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以期科学分析其贫困特征，为建设“减贫之路”提供学理性支持。

二、贫困类型识别的指标体系、评估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尝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贫困水平作出测算、排序和评估。首先基于既有研究确定了重要维度和主要测度指标，构建了贫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然后通过加权综合评估模型得到各国的贫困指数，此外进一步阐明了本研究的评估对象与指标数据来源。

（一）“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的指标体系

第一，在理论基础方面，本研究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人力、社会、自然、物质、金融五个因素为指标体系的基础，将“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作为研究合作国减贫需求的主要目标，从而在把握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找到制定未来减贫合作战略的切入点。这与可持续生计方法（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SLA）的分析思路相契合。可持续生计方法源于阿玛蒂亚·森等的的能力贫困理论，由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首先提出，是一种基于贫困的复杂性成因来理解贫困并提出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其政策目的性较强，为众多国际组织采纳。^① 该框架包括脆弱性内容、五大生计资本、结构和过程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五部分内容（见图 1）。

^① 玛莎·罗伯茨、杨国安：《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地理科学进展》2003 年第 1 期，第 11—21 页。

其中五大生计资本贯穿框架始终，也指出了根除贫困的潜在机会。人力资本（H）指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体现劳动力可用数量和质量；社会资本（S）是人们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如参与的社会组织或团体、政治参与权的行使状况、政策环境稳定性等；自然资本（N）指为生计提供重要服务的自然资源存量，如土地、水、能源等；物质资本（P）指基础设施和生产性商品，如交通、卫生设施、通信及负担得起的电力等；金融资本（F）指人们用来实现生计目标的金融资源，如现金、银行存款、信贷、补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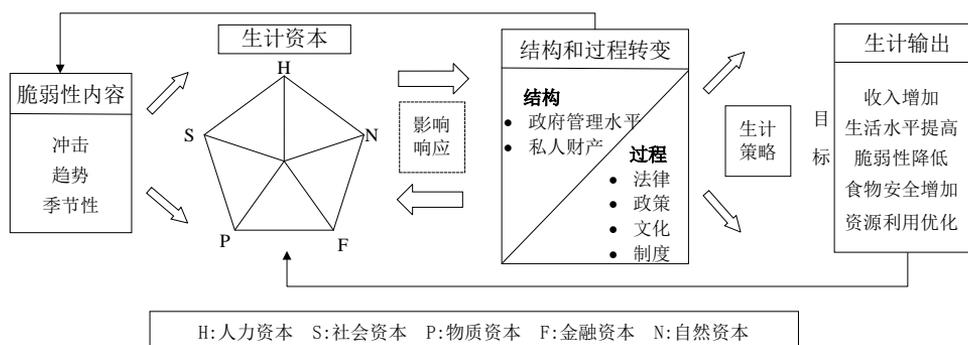


图 1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相关资料制作。^①

SLA 框架将目标群体的资本分为人力、社会、自然、物质、金融五类，并将这种五边形资本结构作为洞察致贫的主要因素。在既有的贫困程度测量和贫困类型划分研究中，五大生计资本已被运用于贫困程度评估、贫困类型划分、致贫因素识别等方面的分析。例如，刘艳华和徐勇将其应用于中国贫困县的类型识别，^② 汪为等将其应用于国家层面的农村居民可持续生计水平评估，^③ 法赫德（Shah Fahad）等在对越南农村进行县级贫困评估中采用五

① Se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ril 1999.

② 刘艳华、徐勇：《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地理学报》2015 年第 6 期，第 993—1007 页。

③ Wang Wei, Zhang Chongmei, Guo Yan, and Xu Dingd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nd

大生计资本的标准。^① SLA 框架在国际发展界已得到广泛应用和探讨,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的识别度和接受度,是开展比较贫困和国际减贫合作研究的重要评估工具。

受 SLA 分析框架中五大生计资本内涵的启发,同时考虑到与“一带一路”全方位互联互通中涉及的人文、制度、基础设施、资金等核心内容相衔接,^② 本文从人力资本、社会治理、资源禀赋、物质联通、金融发展五个方面来建立指标体系的维度框架。

第二,在指标选择方面,基于简洁性和适当性原则,尤其考虑到在全球层面或区域层面的可比性,^③ 本文参考既有相关研究选取了 15 个指标来构建“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见表 1)。具体来看,一是人力资本维度,主要涉及劳动力质量和数量,选取文化教育和健康水平指标表征一国劳动力质量,劳动力参与率则用来衡量一国的有效劳动力数量。二是社会治理维度,主要涉及社会稳定、行政效率、相对平等程度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公共安全、政府可信度、社会公平等关乎人类福祉和人文发展的必要维度。^④ 三是资源禀赋维度,随着人们对资源基础性作用的认识,在贫困的地理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强调资源禀赋等因素。^⑤ 正如 SLA 框架中指出的,如果没有关键的资源服务和自然资源生产的食物,我们都无法生存。^⑥ 本文指标设计中的自然资源主要考虑了作为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资源禀赋情况,借鉴了牛叔文等的研究,^⑦ 此处选取了耕地、水、可再生能源三个指标。四

Health Risks on Rural Househol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 18, No. 20, 2021, 10955.

① Shah Fahad, Nguyen-Thi-Lan Huong, Nguyen-Manh Dung, Hiep Tran-Duc, and Nguyen To-The, "Analyzing the Statu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by Us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Vol. 30, No. 6, 2023, pp. 16106-16119.

② 参见张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观的建构》,《国际展望》2020 年第 4 期,第 111—131 页。

③ 牛叔文、李真、梁曼:《人文发展的多维测度及其政策启示》,《中国软科学》2021 年第 5 期,第 104 页。

④ 同上,第 101—103 页。

⑤ Daniele Malerba,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Colombia," *World Development*, Vol. 127, 2020, 104776.

⑥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ril 1999.

⑦ 牛叔文、李真、梁曼:《人文发展的多维测度及其政策启示》,第 105 页。

是基础联通维度，主要涉及交通通达水平、用电水平和通信水平。基础设施不完善会阻碍获得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的机会，也会降低交易效率，影响创收和就业。五是金融资本维度，按照 SLA 框架主要包括公民的储蓄和资金流入，借鉴了刘艳华等在农村贫困地理识别的研究和张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中的研究，^① 本文以人均国民净收入衡量个人储蓄水平，资金流入则以金融账户开设比例来表征，同时以年均 GDP 增长率测度一国金融发展潜力。具体指标说明参见表 1。

表 1 “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

维度层	指标层	样本数据指标	预期影响	权重
人力资本 H	文化教育 H1	成人识字率	影响劳动力素质，识字率越低、寿命越短，人力资本水平越低，贫困水平越高	0.2006
	健康水平 H2	出生时预期寿命		0.0652
	劳动力比例 H3	15 岁以上劳动力参与率	影响劳动力数量，参与率越低，人力资本水平越低，贫困水平越高	0.0455
社会治理 S	社会稳定 S1	脆弱国家指数	反映社会、政治、军事等综合表现，指数越高、社会越不稳定，贫困水平越高	0.0294
	行政效率 S2	政府效率指数	反映公共服务质量、政策执行效率等，指数越低，社会治理能力越差，贫困水平越高	0.0228
	相对平等程度 S3	基尼系数	反映社会公平程度，系数越小，社会相对越平等，社会治理能力越强，贫困水平越低	0.0779

^① 刘艳华、徐勇：《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第 996 页；张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第 131 页。

资源禀赋 N	土地资源 N1	人均耕地	土地资源、水资源不足，无法保证民众基本生存需要，贫困水平越高	0.0140
	水资源 N2	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		0.0155
	可再生能源 N3	可再生能源消耗占最终总能源消耗的比重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越低，资源面临不可持续性，预期贫困水平越高	0.0663
物质联通 P	交通通达水平 P1	物流绩效指数	不完善的交通设施、电力和通信条件，影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获得的及时性，影响产品运输成本等，条件越差，贫困水平越高	0.0102
	通电水平 P2	享有通电人口的比重		0.2814
	通信水平 P3	使用互联网的个人占总人口的比重		0.0113
金融资本 F	储蓄水平 F1	人均国民净收入	收入和借贷服务的水平越低，没有充足的储蓄和资金流入保障，无法满足粮食、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贫困水平越高	0.0180
	借贷服务 F2	15 岁以上个人金融或数字货币账户开设比例		0.0607
	发展潜力 F3	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低，金融发展受影响，贫困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来改善生活条件，贫困水平越高	0.0811

注：指标 S1 的数值范围为 1（好）~180（差）；指标 S2 数值范围为-2.5（弱）~2.5（强）；指标 S3 数值范围为 0（完全平均）~100（完全不平均）；指标 P1 数值范围为 1（低）~5（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指标体系评估方法

既有研究中关于贫困测度的方法，主要涉及识别平均能力剥夺的模糊集方法、双阈值法、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效率方法、构造权重的统计分析方法

等。^① 本文采用构造权重的统计分析方法，更适宜个体样本之间贫困程度的比较。^② 评估方法步骤如下：首先，数据标准化处理。基于表 1 “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为消除不同指标量纲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的数值 Y_{ij} 。其次，指标赋权。由于构成贫困的因素多元，且因素间相关性较大，主观赋权法易带来指标体系的不稳定，恐难厘清指标贡献度，故借鉴区浩驰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测度中采用熵值法赋权的方式，^③ 本文从数据的客观性出发，运用熵值系数与复相关系数进行组合赋权。熵值法得到的权重大小反映了指标离散程度。复相关系数法得到的权重大小反映指标间信息量的重复度。通过乘法合成的方式得到指标权重 W_j （见表 1），权重值越大说明该指标的数据值在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异较大，且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较弱，具有更强的区分贡献。最后，计算贫困指数。利用指标权重和各指标标准化值，采用加权综合评估模型得到“一带一路”国家综合贫困指数及其五个维度的贫困指数 I_i ，最终指数越高，贫困水平越高。贫困指数计算方法为：

$$I_i = \sum_{j=1}^n W_j * Y_{ij}$$

式中： I_i 为 i 国的贫困指数， W_j 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Y_{ij} 为标准化后的数值。

（三）数据来源

在评估对象方面，本研究以 2023 年 1 月中国一带一路网显示的 151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基础样本，^④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在剔除数据缺失的国家和经合组织（OECD）国家后，最终选取“一带一路”

^① Rati Ram, “Composite Indices of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Basic Needs Fulfillment, and Income: A Principal Component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1, No.2, 1982, pp. 1328-1343; Sabina Alkire and James Foster,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5, No. 7, 2022, pp. 476-487.

^② 参见邹薇、方迎风：《怎样测度贫困：从单维到多维》，《国外社会科学》2012 第 2 期，第 63—69 页。

^③ 区浩驰、郭凯迪、王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及中国合作建议》，第 178 页。

^④ 笔者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整理，参见：<https://www.yidaiyilu.gov.cn/>。

共建国家中的 69 国为评估对象，其中非洲国家 29 个、亚洲国家 24 个、欧洲国家 11 个、拉丁美洲国家 5 个。为克服某些年份数据特殊性的影响，选取 2017—2021 年为研究期，取 5 年均值。

在指标数据方面，指标 S1 来自和平基金会的脆弱国家指数（FSI），指标 S2 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WGI），其他指标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个别指标缺少某一年的数据，采用前一年数据近似替代。少数国家缺少个别年份的某项指标数据，采取均值插补法进行处理。

三、贫困程度与贫困成因类型分析与讨论

根据以上研究设计，本文得到了 69 个研究对象国的综合贫困指数和分维度贫困指数，并根据测度的结果从贫困程度类型、贫困成因类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贫困程度类型

从贫困程度来看，“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贫困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综合贫困指数最高的是非洲国家乍得（84.51），最低的是东欧国家克罗地亚（17.36）。将 69 个研究对象国的综合贫困指数从高到低排序，排名前 23 位的国家属于第一类，即高贫困度国家；排在中间 23 位的国家属于第二类，即中等贫困度国家；排在后 23 位的国家属于第三类，即低贫困度国家（见图 2）。三种类型的贫困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类：高贫困度国家，主要包括非洲 20 国和巴基斯坦、缅甸、伊拉克 3 个亚洲国家，由此可见，全球的贫困现象仍然主要集中在非洲。这类国家和地区是未来国际减贫合作中重点瞄准的区域。具体来看，非洲国家整体综合贫困指数高，根据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均为非洲国家，包括乍得、布基纳法索、塞拉利昂、莫桑比克、贝宁、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莱索托、刚果（布）、马达加斯加。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方面条件优越，没有表现出较明显的发展限制问题，但其他方面表现较差，尤其在物质联通维度存在明显短板。如塞拉利昂电力供应紧张，80%的电力供应集中在首都，广大农村电

力供应基本为零。^① 南亚国家巴基斯坦、东南亚国家缅甸、西亚国家伊拉克的综合贫困指数在亚洲国家中属于高贫困度。根据 UNDP 的报告，由于新冠疫情，2020 年缅甸 83% 的家庭平均收入减少了近一半，贫困率有所上升。^②

第二类：中等贫困度国家，包括尼泊尔、柬埔寨 10 个亚洲国家，南非、科特迪瓦等 9 个非洲国家，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 4 个拉美国家，呈现出亚非拉平均聚集的特点。亚洲国家的综合贫困指数差异较大，排名分布较为分散。此类型中涉及南亚国家尼泊尔、孟加拉国；西亚国家黎巴嫩、伊朗；东南亚国家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非洲国家中，加蓬和突尼斯的综合贫困指数最低，贫困程度较低。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加蓬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拉美地区国家虽然整体贫困表现优于部分非洲和亚洲国家，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突出，根据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2022 年全球不平等报告》，拉美国家中前 10% 最富裕的人占有国民收入的 55%。^③

第三类：低贫困度国家，包括 11 个亚洲国家、11 个欧洲国家及拉美国家乌拉圭。该类型中罗马尼亚、乌拉圭、塞浦路斯、阿联酋、克罗地亚 5 个国家的贫困指数最低，整体发展较好。从亚洲国家来看，阿联酋、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泰国等国家的综合贫困指数较低。哈萨克斯坦减贫成效显著，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该国贫困率（收入低于 5.5 美元/天的人口比例）由 2001 年的 61.6% 下降至 2021 年的 4.6%。^④ 从拉美国家来看，在所测度的 5 个国家中，贫困率最低的为乌拉圭，该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表现稳健，政局稳定。从欧洲国家来看，得益于在劳动力素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比较突出的表现，这些国家的综合贫困指数整体较低。

①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塞拉利昂 2021 年版）》，第 19 页，<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sailaliang.pdf>。

② “COVID-19, Coup D'état and Poverty: Compounding Negative Shocks 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Development in Myanmar,” New York: UNDP, April 30, 2021, p. 3, <https://www.undp.org/asia-pacific/publications/covid-19-coup-detat-and-poverty-compounding-negative-shocks-and-their-impact-human-development-myanmar>。

③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 World Inequality Lab, March 2023, p. 11, https://wir2022.wid.world/www-site/uploads/2023/03/D_FINAL_WIL_RIM_RAPPORT_2303.pdf。

④ 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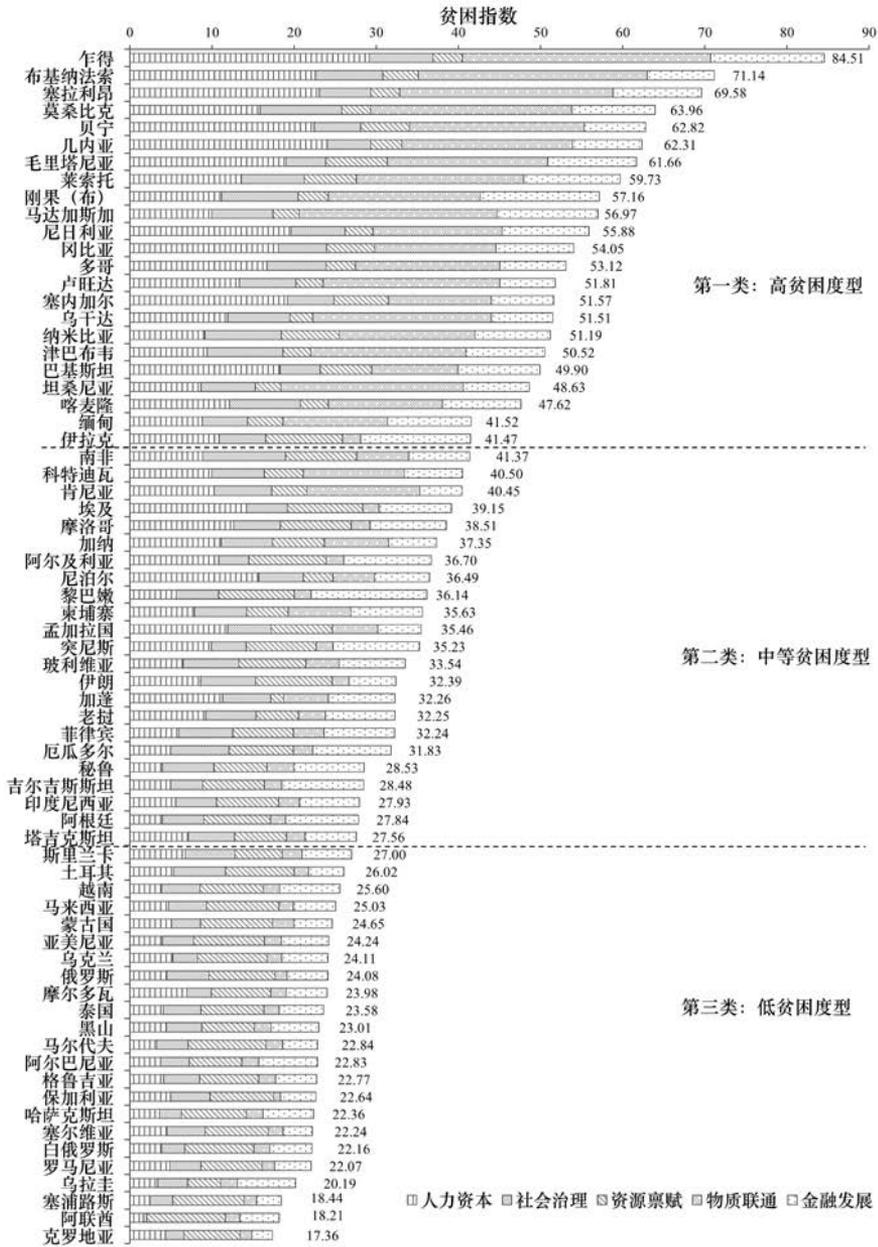


图 2 “一带一路”国家贫困指数及贫困程度分类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贫困成因类型

有针对性地识别“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短板和贫困成因，可以在未来国际减贫合作中做好合作方式和参与主体的选择。此处分别根据五个维度的测度结果，将 69 个研究对象国进行由高到低排序，排名前 23 位的国家在该维度贫困指数较高，据此将其划分为人力资本缺乏型贫困、社会治理不足型贫困、资源制约型贫困、联通落后型贫困、金融发展滞后型贫困五类（见表 2）。需要指出的是，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现象，本文关于贫困成因类型的分析尝试从比较视角识别出研究对象国更突出的致贫因素，研究目的并非强调贫困成因的唯一性，故此处并不进行排他性的分类，也有助于决策者更全面地了解“一带一路”国家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根据表 2 的分类结果，卢旺达、莫桑比克等 19 个非洲国家同时具有三种及以上的贫困类型特征，且大部分属于高贫困度国家。由此可见，多种要素的缺乏是导致其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外界聚焦减贫的强发展干预对此类国家来说是必要的。^①

第一，人力资本缺乏型贫困。以劳动能力、教育文化程度、专业技能等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反映了民众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劳动数量和质量也决定着—国能否有效运用其他资本。既有研究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教育关联会反映在子女的收入、职业状况中，并产生一定的代际传递。^②“一带一路”国家中人力资本缺乏型国家的地理聚集特征明显，主要分布在乍得、几内亚等非洲 20 国，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3 个南亚国家。根据世行的成人识字率指标，该类型国家的平均成人识字率为 61.2%，其中乍得成人识字率仅为 26.7%。乍得是非洲科技和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小学阶段为义务教育，女童小学毕业率为 38%，男童为 49%。^③在医疗卫生方面，尼日利亚近年来医疗卫生条件虽有所改善，但缺医少药的问题仍较为严重，城市卫生设施覆盖率为 39%、农村为 27%，预期寿命仅为 52.5 岁。^④

^① 参见李小云、季岚岚：《国际减贫视角下的中国扶贫——贫困治理的相关经验》，《国外社会科学》2020 年第 6 期，第 46—56 页。

^② Daniele Malerba,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Colombia,” *World Development*, Vol. 127, 2020, 104776.

^③ “Chad: Education Country Brief,” UNESCO, January 2024, <https://www.iicba.unesco.org/en/node/75>.

^④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尼日利亚 2023 年版）》，第 9 页，

孟加拉国医疗保健部门的公共支出常年较低，个人卫生保健自付费用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为 63.3%—67%，普遍高于南亚其他国家。^①

表 2 “一带一路”国家贫困成因类型及地区分布特征

贫困类型	划分标准	国家	区域分布
人力资本 缺乏型	$I_i \geq 11.09$	乍得、几内亚、塞拉利昂、布基纳法索、贝宁、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冈比亚、多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埃及、莱索托、卢旺达、摩洛哥、喀麦隆、乌干达、孟加拉国、加蓬、刚果（布）、加纳	非洲 20 国、亚洲 3 国
社会治理 不足型	$I_i \geq 6.33$	南非、莫桑比克、刚果（布）、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喀麦隆、布基纳法索、乍得、莱索托、乌干达、马达加斯加、多哥、厄瓜多尔、肯尼亚、卢旺达、玻利维亚、伊朗、坦桑尼亚、菲律宾、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土耳其、柬埔寨	非洲 17 国、亚洲 4 国、拉美 2 国
资源制约 型	$I_i \geq 7.75$	阿联酋、马尔代夫、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埃及、马来西亚、蒙古国、塞浦路斯、南非、摩洛哥、亚美尼亚、突尼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土耳其、玻利维亚、阿根廷、俄罗斯、毛里塔尼亚、厄瓜多尔、保加利亚	亚洲 9 国、非洲 6 国、欧洲 5 国、拉美 3 国
联通落后 型	$I_i \geq 12.29$	乍得、布基纳法索、塞拉利昂、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贝宁、几内亚、莱索托、毛里塔尼亚、津巴布韦、刚果（布）、多哥、纳米比亚、缅甸、冈比亚、喀麦隆、肯尼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巴基斯坦	非洲 21 国、亚洲 2 国

<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niriliya.pdf>.

①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s (Primasys): Comprehensive Case Study from Banglades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https://iris.who.int/handle/10665/341106>.

金融发展 滞后型	$I_i \geq 8.81$	刚果（布）、黎巴嫩、乍得、伊拉克、马达加斯加、莱索托、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突尼斯、莫桑比克、缅甸、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津巴布韦、喀麦隆、厄瓜多尔、冈比亚、摩洛哥、纳米比亚、柬埔寨、埃及	非洲 16 国、亚洲 6 国、拉美 1 国
-------------	-----------------	--	--------------------------------

注：表中所列国家顺序即为各维度贫困指数（ I_i ）由高至低的顺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社会治理不足型贫困。社会资本提供了具有支持性和凝聚力的社会环境，它可以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安全网络，有效调动国内资源。其中有效的社会治理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从而建立起资源利用和减贫之间的联系，成为推动有效减贫的工具。社会治理不足型贫困国家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收入不平等治理、社会福利惠民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贫困有效治理韧性不足。该类型国家主要涉及南非、尼日利亚等 17 个非洲国家，伊朗和土耳其 2 个西亚国家，菲律宾和柬埔寨 2 个东南亚国家，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2 个拉美国家。南非虽然是非洲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但其 2014 年基尼系数高达 63.3%，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益突出，2023 年失业率为 28.4%，是全球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① 拉美地区收入分配改善举措成效不彰，地区平均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厄瓜多尔 2021 年基尼系数为 45.8%，随着以中低收入者为主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因政府取消燃油补贴等原因，引发国内社会动荡。

第三，资源制约型贫困。自然资源是维持生计的基础性条件，贫困地理环境论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是导致某些地区贫困率高发和减贫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考虑到代际公平，提高生产资料、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些均是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矛盾的有效手段。“一带一路”资源制约型国家的地理分布较分散，也体现了国家间存在的资源和能源差异。该类型中的阿联酋、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面临着缺水问题，由此引发了

^① 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马来西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比重较大，资源利用的可持续问题值得关注。同时，仍然要注意的是，非洲国家虽然在该维度整体表现较好，自然资源禀赋充足，但资源利用效率低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赞比亚人均耕地面积为 0.2 公顷，是中国的 2 倍多，^① 但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由于粗放型种植技术难以满足食物和营养需求，该国总人口中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达 32.6%。^②

第四，联通落后型贫困。基础设施是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重要催化剂，从中国的减贫经验来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是经济增长和减贫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五通”之一的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领域，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带动就业和增加收入的关键性要素。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的联通落后型贫困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既有研究指出，电网薄弱是制约非洲电力开发的主要瓶颈，非洲一人均用电量每提高 1%，其人均 GDP 将提高 0.09%。^③ 根据世界银行的通电人口比重指标数据，当前乍得、布基纳法索的通电率仍低于 20%，属“一带一路”国家中最低水平，且扩大电力供给的进程十分缓慢。在东南亚国家中，缅甸电力部制定的 2030 年实现电力全覆盖计划受疫情、政情变化影响未能如期推进，全国用电覆盖率仅 55%。^④ 在南亚国家中，巴基斯坦的公路密度为 0.62 公里/平方公里，^⑤ 远低于南亚其他国家的水平。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该类型中的部分国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如截至 2021 年卢旺达互联网普及率为 67.2%，同比增长 26.5%。^⑥

第五，金融发展滞后型贫困。金融资本是贫困群体较难获得的资本，但

① 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②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2: Repurposing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to Make Healthy Diets more Affordable,” FAO, 2022, p. 138, <https://doi.org/10.4060/cc0639en>。

③ 张锐：《非洲能源转型的内涵、进展与挑战》，《西亚非洲》2022 年第 1 期，第 51—72 页。

④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缅甸 2023 年版）》，第 25 页，<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miandian.pdf>。

⑤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巴基斯坦 2023 年版）》，第 15 页，<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bajisitan.pdf>。

⑥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卢旺达 2022 年版）》，第 25 页，<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luwangda.pdf>。

也是五类资本中用途最为广泛的。金融服务的广泛覆盖能够支持国家实体经济发展,还可以有效缓解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根据测度结果,“一带一路”金融发展滞后型国家主要包括莱索托、埃及等 16 个非洲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等 6 个亚洲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厄瓜多尔。该类型中的低收入、中低收入国家占 91%,普遍面临金融困境。根据世界银行的个人金融账户拥有率指标,柬埔寨 2020 年为 27.5%,意味着有七成以上的柬埔寨成年人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在东南亚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自 2019 年底以来,黎巴嫩陷入严重金融危机,世界银行通货膨胀率指标显示,2022 年该国达到 171.21%,贫困问题再度凸显。^① 该类型中的非洲国家虽面临各类经济发展瓶颈,但发展诉求强烈,如阿尔及利亚在其《2016—2030 年国家经济多元化和转型战略》中将金融和经济领域改革列为五大发展方向之一。^②

四、结论与建议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把握“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特征与减贫需求对于中国与共建国家实现务实、可持续的减贫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构建“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从贫困程度类型和贫困成因类型两方面,为国际减贫合作中的区域瞄准、方式选择和多主体参与提供政策参考。研究发现,在贫困程度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贫困状况呈现较大差异,主要分为三类:高贫困度型、中等贫困度型、低贫困度型。在贫困成因方面,根据各维度贫困指数情况可以将“一带一路”国家划分为五种类型的贫困:人力资本缺乏型、社会治理不足型、资源制约型、联通落后型、金融发展滞后型。整体来看,贫困程度与贫困成因存在较强的关联度,如分布在高贫困度的非洲国家普遍受人力资本缺乏、社会治理不足、基础联通落后、金融发展滞后等多维致贫因素影响;亚洲部分贫困指数较高的国家,其致贫因素集中在自然资源制约、金融发展滞后等方面。

① 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②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阿尔及利亚 2023 年版)》,第 19 页, <https://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aerjiliya.pdf>。

结合上文贫困类型识别结果和已有的“一带一路”减贫合作项目及实践经验，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新型国际减贫合作的地理空间治理。聚焦“一带一路”重点贫困带，加快推进减贫合作进程。根据上文按贫困程度划分的类型结果，“一带一路”国家的贫困呈现明显的地区聚集特征。未来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减贫合作应立足现有中非合作论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上合组织区域合作、六大经济走廊、中国—中东欧等次区域合作机制，统筹好重点和全面的关系，重点聚焦极端贫困国家，在空间资源分配方面契合高度贫困型国家的发展需求。首先，针对第一类高贫困度国家以非洲国家为主的情况，在中非合作“九项工程”等减贫惠民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在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期间推出系列聚焦“发展与减贫”的“小而美”“惠民生”务实合作项目，通过平行经验分享等方式激活源自发展中国家自身实践探索的鲜活经验，同时通过二十国集团（G20）下“减少不平等、贫困与饥饿”工作组、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减贫优先领域等机制为全球减贫治理探索新规范和路径。其次，针对亚洲部分国家属高贫困度或中等贫困度的情况，重点瞄准巴基斯坦、缅甸、伊拉克、尼泊尔、柬埔寨等国，充分发挥孟中印缅、中国—中亚—西亚和中巴等经济走廊的合作优势，探索农业农村发展、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医疗卫生服务、信息技术扶贫等领域的新合作模式。例如，中柬友好扶贫示范村项目成功结合了当地社区的具体需求与中国的农业技术。项目中引入高效灌溉系统和培训农民使用现代农业技术，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出和村民的收入。同时，项目还引入了中国的教育资源，建立了小学和技术培训中心，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平和就业技能，从根本上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①此外，聚焦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解决，建设次区域减贫合作样板项目，打造民生走廊。例如，在中巴经济走廊的框架下，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建设了多个水电站项目，不仅为巴方提供了必需的能源，而且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区的减贫。^②这些实例项目旨在展示如何通过跨国合作和地区联动有效解决贫困问

^① 《中柬友好扶贫示范村项目建设正式启动》，新华网，2021 年 1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1/29/c_1127043540.htm。

^② 《能源合作“照亮”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网，2023 年 7 月 14 日，<https://www.yidai>

题。每个样板项目都应考虑到地区间的差异性，确保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性和当地社区的全面参与。

第二，强化国际减贫合作中的靶向施策治理。围绕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将中国减贫经验与国际合作资源瞄准特定国家。针对人力资本缺乏型国家，未来合作中要注重增加贫困群体获得教育、医疗的机会，中国可以支持建立职业培训中心和提供远程教育资源，以提高教育的覆盖率和质量。同时，合作建立公共卫生项目，改善基础医疗条件。对于乍得、孟加拉国等贫困指数较高的国家，适时分享中国“两不愁、三保障”等政策经验，通过政府投资保障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住房安全和基本医疗。针对社会治理不足型国家，在未来合作中要注重强调减贫的制度因素，建立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政府间政策交流为支撑的减贫合作沟通机制。当地政府可利用其所掌握的行政和财政资源，开展益贫性项目。在柬埔寨，中国政府支持的治理改革项目通过提供行政管理培训和资金支持，增强了当地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能力，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透明度。^① 针对资源制约型国家，在合作中开展水资源管理和节能减排项目，如建设小型水库、推广太阳能和风电设施。同时，注重拓展绿色发展、低碳合作、能源规制等新议题。针对联通落后型国家，加强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面向女性和农村群体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建设、互联网接入的提升。在尼泊尔，中国的援助项目建设了多个供水设施和农村道路，这些基础设施直接改善了妇女和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提供了更安全和便捷的公共服务。^② 针对金融发展滞后型国家，强调合理运用相关金融工具，通过普惠金融带来均等的发展机会，适当增加中资银行在沿线国家的网点布局数量和融资业务，同时，可以考虑在当地乡村、社区适时分享乡村小额信贷扶贫的经验。

第三，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国际减贫合作模式。在贫困类型划分的结果中，乍得等 19 个非洲国家同时存在三种及以上的贫困类型，这需要充分

yilu.gov.cn/p/0LCAMAMA.html。

① 《中国发展模式海外（柬埔寨）研修班成功举办》，商务部网站，2024 年 1 月 12 日，<http://cb.mofcom.gov.cn/article/zxhz/tzdongtai/202401/20240103466212.shtml>。

②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侯艳琪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没有什么能干扰中尼合作大方向》，环球网，2022 年 4 月 16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7cc02vEkws>。

发挥多元主体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以寻求更有效和更可持续的减贫突破。首先，医疗援助组织、教育交流协会、民间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具有民间性、公益性的优势，可以考虑通过医院对口合作、助学计划、社会救助等民生项目，重点针对人力资本缺乏型国家开展减贫援助。其次，推动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承担好减贫社会责任，可以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桥梁，同时也可以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鼓励跨国农业企业和数字技术企业在资源利用低效和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引入适用技术和管理知识，提高当地产能。例如，跨国农业企业在某些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国家中可以作为中国农业技术海外转移合作的载体，分享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数字企业可以考虑非洲的发展潜力和投资吸引力，提高基础联通落后型国家的互联网接入与移动通信水平。再次，科研智库中的区域国别研究、国际教育合作和政策咨询等为贫困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利用智库的研究能力，为贫困治理提供基于事实的政策建议，与地方智库合作，推动政策的本地化实施。对于社会治理不足型国家，不仅要重视政府间的合作，也要重视中国智库与当地智库、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最后，考虑整合现有各种类型的“一带一路”减贫合作联盟资源，并加强与联合国全球层面、区域层面上相关联盟与倡议之间的互动和对接，推动减贫经验的平行分享。重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组织间的协作，以及这些主体与当地社区的合作，强调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和责任，通过定期的会议和工作组，确保策略的一致性和实施的有效性。

对“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特征进行类型识别，有利于加强中国减贫经验的适应性分享，识别全球范围内不同区域国别中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减贫合作模式的差异性，从而为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也为中国在新时期参与全球减贫治理规范的完善提供支持。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研究在指标选取中，未纳入环境、气候等因素，未穷尽人力资本等指标。未来“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应进行定期测度评估，纳入尽可能多的样本国家。同时，对中国国际减贫合作典型示范案例的研究也值得深入推进，以丰富基于中国发展的全球减贫知识供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责任编辑：石晨霞]

design of policy instruments is implemented on three level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ll three economies emphasize the reshaping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capacity, but each focuses on different sectors; at the regional level, near-shoring and friend-shoring strategies are pursued in parallel, supported b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and at the global level,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rul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ability to set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are key objectives. Looking ahea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ly chain security mechanisms b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will pos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Regional cooperation, as a key mechanism, may lead to the trend of multi-chain parallelism which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KEYWORDS: industrial supply chains, security mechanisms, guiding ideology, policy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overty 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verty-Reduction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XU Xiuli, ZHAO Jie, and SUN Jin

ABSTRACT: Identifying the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ountries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 in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classifications is a key task in effectively sharing China's experience in poverty reduct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identifying the poverty types of the BRI count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large disparities in poverty levels among the BRI countries. High-poverty countries are concentrated in Africa, medium-poverty countries are more evenly distributed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nd low-poverty countries are found in a few Eurasian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causes of poverty, high-poverty countries are often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compounding factors. Medium-and-low-poverty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tend to have single or dual attributes of the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causes: lack of human capital, lack of social governance, resource constraints, under-connectivity, and lagging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regional targeting, modality choices, and multi-actor participation paths in international poverty-reduction cooperation,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categorization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poverty governance, poverty typ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